

《解放日报》改版

冯慧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办的第一张大报。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随中共撤离延安而停刊,前后历时5年零10个月又11天,累计出版2130期。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5月,上海《解放日报》正式创刊。

报社的管理和主要领导人员

创刊之初,解放日报社归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与管理,日常工作由报社的编委会具体负责。博古任《解放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后为廖承志、杨松、陆定一、余光生先后任报社总编辑。原新华社报社的工作人员,原新华社通讯科工作人员,以及中央组织部从鲁迅、马列学院、文协等单位调入的人员构成了报社主要成员。

依据1943年3月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解放日报社归政治局、书记处之下的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毛泽东任该宣传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关心并支持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

在《解放日报》创刊当天,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确定了该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报宗旨。他不仅经常为报纸写稿,先后向《解放日报》提供(包括命名修改)的文章有40余篇,还为报纸推荐稿,他曾为报纸第四版撰写了征稿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报纸文章的质量。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报社内部,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曾和博古社长一同主持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

可见,《解放日报》的创办得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扩充版面与增强党性

《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前后历经两次较大的调整,分别是1941年9月16日与1942年4月1日。第一次调整重在扩充版面,第二次调整重在增强报纸的党性。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对版面作了第一次调整,由两版扩充



日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放日报》创刊号

为四版。一版为以国际新闻为主的要闻版;第二版为国际版,刊登远东和太平洋战争的相关消息,以及其他国际问题的专论;第三版为国内版,以发表国统区的消息为主,也常发表有关边区政治、经济等理论文章,第四版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边区栏,发表有关边区的消息,下半部分是专刊,至第二次调整之前,先后创办了“文艺”“青年之页”“中国工人”“敌情”“中国妇女”“科学园地”“军事”“卫生”八大专刊,满足了青、妇、工等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的改版则对版面做了较大调整,大幅增加了关于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报道在整张报纸中的比例,并将其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与此同时,压缩了国际新闻的篇幅并放在第三版。此前的《解放日报》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国外通讯社的党报”,对党的政策主张、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反映过中,未能真正成为战斗的机关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解放日报社着手改版工作,将报道重点由国外转向国内,转向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相应地,其版面发生了较大调整。

第一版依旧是要闻版,但是内容由原先的以国际新闻为主转为以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为主,辅以内外的重大新闻;第二版由原先的国际版变为国内版,重点发表陕

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消息,辅以内统区和敌占区的新闻;第三版由原先的国内版变为国际版,有时也发表国内的重要消息,也就是说,将原先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顺序互换,把国内版置于国际版之前;第四版由原先边区消息与八大专刊混合排版的情况,变为以文艺专刊为主的综合性副刊,并正式以“副刊”命名,除了此前的八大专刊陆续不定期出现在“副刊”上外,解放日报社还根据形势和政策的需要,开辟了“学习”“新闻通讯”等专刊,体现了报社较大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在相应版面上,《解放日报》除刊载社论、专论、重要的国内外通讯以外,还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开辟了“批评与建议”“小言论”“三言两语”“信箱”“一得书”“党的生活”“群众呼声”“来函照登”等栏目,丰富了报纸的内容,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聚焦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生活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改变了此前以国际新闻为主的报道取向,转而重点反映党的各项政策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努力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该报对整风运动、党的七大以及大生产运动的报道,格外引人注目。

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刊发大量社论、理论文章、新闻通讯、杂文,并辟“党的生活”专栏,“学习”副刊,

“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等,用多种形式,从多个维度论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的表现和危害,阐述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介绍了党员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的经验方法,报道了各机关单位学校和根据地整风运动的进展,从而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对党的七大的宣传中,从大会开始至闭幕,《解放日报》持续不断发表消息,及时向读者传递了会议的最新消息。同时,配发重要社论和党的领导人在会上的重要报告,如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所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为党员干部学习会议精神提供了文本基础。会后,又报道了各地学习七大文件的盛况,为学习会议精神营造了舆论氛围。

在大生产运动中,《解放日报》报道了吴满有、赵占魁、南泥湾等一批先进的生产典型,以典型带动一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总之,经过改版,《解放日报》增强了党性,在内容上加大了对党的政策和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的宣传力度,实现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向“完全的党报”的转变。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大报,《解放日报》向民众传递了党的声音,在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中都贡献了重要的媒介力量。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时十余日的考察中,一些地方条件之艰苦、交通之不便,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考察团成员们依然不辞劳苦,克服困难,忠实地履行了职责。

两次实地考察结束后,考察团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题为《关于修建兰渝铁路的专题报告》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参加了考察活动的邓成城,一次次看到、听到、感受到了甘、川两省,尤其是当时甘肃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渴望通过铁路脱贫致富的迫切心情。邓老说:“我更加坚定了兰渝铁路上马后,能为西南、西北人民造福的信心。”

2000年3月,正值初春时节,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在参加人大甘肃代表团的讨论时说:“关于修建兰渝铁路,有几十位老同志给我写过信,我已批给他们研究……兰渝铁路应该修……”

2005年9月,“十一五”规划正在酝酿制定中,邓老以紧急提案的形式,向全国政协和国家发改委、铁道部等有关部委提出了新的建议。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12月27日,邓老收到了铁道部对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4489号提案的答复:“我部已将铁路纳入‘十一五’规划。”

修建兰渝铁路、发展西部经济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邓老说,12月下旬,正是西北的隆冬季节,但这份提案答复却如一股暖流,在他的面前呈现出一副壮观的画卷:一条钢铁巨龙横跨在陇原大地之上,一列列车在铁轨上奔驰……今天,这些画面已经成为现实。

陈独秀押送车中酣然入梦

周二中



陈独秀曾经作过这样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此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经分别于1927年、1928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0月19日夜里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

要知道,此行极有可能是走向生命的终点,因为在国民党内部,要置陈独秀于死地的人很多。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不料陈独秀一上车,毫无惧色,倒头便睡,并且鼾声大作。一宿

无事,车到下关时看守人员才把沉睡中的他叫醒。这样子,俨然是一次出门旅游,甚至比旅游者还放松坦荡,不担心行李被偷被抢,因为有着看守保护着呢。想必当年那些看守见到陈独秀恬然入梦的样子也会惊诧莫名:死到临头了,这人怎么还睡得着?

陈独秀去世后,高语罕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特意提到这件事,说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当时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也不想请律师,章士钊愿义务为他辩护,法庭上章士钊总是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不料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大有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决然风格。

陈独秀后被判了8年。



曾敏之专访周恩来

刘浪

曾敏之秉持“书生报国、秃笔一枝”的信条,毕生奋斗在新闻采访与文学创作两大领域,曾获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

曾敏之于1942年入职《大公报》。1946年4月28日,他通过宋平、章文晋的帮助,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对周恩来进行专访。周恩来“英姿焕发,穿一套新的蓝色的中山装”,与曾敏之畅谈了两个晚上。周恩来谈到了他的出身、经历,怎么走上革命道路,怎么从“西安事变”开始与国民党谈判,以及时下谈判的艰难和形势的严峻。

在采访的过程中,周恩来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陕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但不气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采访结束,周恩来还特意曾敏之题字:“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不久,曾敏之写出长篇报道《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后改题为《周恩来访问记》),先发表在重庆的《新生代》杂志,后被上海的进步刊物《文萃》全文转载,轰动文坛和政界。在此之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简单写到过周恩来。但这是周恩来首次接受中国记者专访,也是首次全面系统地将他寻求救国之路的非凡经历公之于世。

尤值一提的是,这篇报道并非典型的一问一答式的访问记,而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报告文学。它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中共领袖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范,现壁录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曾敏之重读这篇旧稿,不禁唏嘘,提笔写下《重读周恩来访问记旧作有感》:

昔文重见鬓毛斑,风雨嘉陵叹逝川。飒飒英姿成永忆,煌煌勋业耀尘寰。

刚、秀、和、天、润、雅这8个字来形容,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题字。有些很小的单位也找启功题名,以壮声威。这样一来,假冒的题字也随之而来了。而启功总是微笑着说:“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机吃它一两顿。”他又自叹道:“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

一次,有一位画商前来拜访启功,他想得到启功的一件墨宝。但此人品行不佳,启功早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门后,隔着门问画商:“你来做什么?”画商回答说:“我来看看您的。”启功走近门旁,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一脸尴尬,嚷嚷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启功幽默风趣地对画商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物吗?”画商听后,悄然无声地走了。



周立波的“开山之作”

崔鹤同

1928年二三月间,20岁的周立波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离开家乡湖南益阳来到了上海。1929年秋,周立波考取了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

劳动大学是免费的,但大家要做工友的工作以减轻学校的负担,周立波和同学就经常轮流去买菜。买菜的次数多了,就遇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周立波把这些趣事告诉了朋友,仍意犹未尽,于是就写了一篇千字文《买菜》。文中谈到被迫早起去菜市场,睡眠惶恐、哈欠连天的无奈,菜市场嘈杂声的生动景象和市民百态的烟火气息,以及买菜后可以大口福的喜悦——两个早起买菜的同学可以吃平时8个人的早餐。文章写好后,他还开玩笑地署了个“小妮”的女性笔名,寄给了当时上海刚兴起的《申报》副刊。

文章寄出后,周立波天天追着报纸看发表了没有。果然,没多久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也没有想到可以拿稿费。当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时,他并没有重视,也懒得去领,指使刘姓表弟去领。未曾想,稿费竟有4块大洋之多,当时一般劳工一个月工钱也就三四块大洋。这着实让周立波惊喜不已。

一篇小文不仅使周立波发现了

自己的写作天赋,而且能带来不错的收入,这又使他不经意间找到了一条谋生的路。他身形高大,年轻力壮,失眠、抽烟、喝酒也和他绝缘,加之他才思敏捷、文采斐然,正是搞写作的料。于是,他豪情满怀、潜心创作,很快在文坛崭露头角。

《买菜》那篇戏文,竟成了周立波轰动文坛的开山之作,这得感谢当年《申报》副刊编辑的慧眼识珠。这篇小文发表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9日,开启了周立波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之旅,他创作出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长篇巨著,和赵树理并称“南周北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兰渝铁路开通那一刻,他的眼眶湿润了

——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邓成城讲述兰渝铁路立项背后的故事

崔莹 邱瑾玉 师向东

“穆桂英的武艺高,半天云里走一遭……”当岷州花儿在D752次列车上唱响时,我们想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邓成城连续11年的呼吁,在欢庆建党100周年之时,笔者来到甘肃省政协第七、八届副主席邓成城家中,听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讲述为修建兰渝铁路不懈建言的往事。

“十余载,我从未想过放弃”

早在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用“中国铁路系统中最重要者”和“经过物产极多矿产极富之地区”来描述兰渝铁路。“1995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由我牵头,联名甘肃和四川两省的代表、委员,联合向全国两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包括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时我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我一个个去找,请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从西南、西北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出发,把修建兰渝铁路纳入国家计划。自此,一直到2008

年兰渝铁路开工建设之前,我每年都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建设兰渝铁路的提案。”回忆起当年事,邓老难掩激动,过往细节如电影般历历在目。

“创造‘奇闻’的兰渝铁路秘书处

兰渝铁路这一战略大通道从无到有,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辛劳。一位叫赵均国的人反复出现在邓老的回忆中。

1994年5月,甘、川两省部分县(市、区)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在四川省苍溪县原副县长赵均国热心协助下,自发成立了推进兰渝铁路立项上马的非官方组织——兰渝铁路秘书处。从成立之初起,赵均国同志一直担任兰渝铁路协作会秘书长。

秘书处把沿线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县(市、区)党政领导联合了起来。1994年10月,一份盖有68枚地县两级党委、政府印章的《关于申请新建兰渝铁路立项的报告》,上报给了甘肃、四川两省政府以及当时的国家计委和铁道部。此举一时被称为中国的“奇闻”。

有了沿线地方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权威部门的科学论断。赵均国带着秘书处的同志们邀请铁道部第一(兰州)和第二(成都)勘察设计院

的专家进行考察论证。并于1995年2月完成了《新建铁路兰州至重庆线预可行性报告》。

1996年5月,秘书处陪同铁道部经济规划院对兰渝线进行考察,经济规划院在考察后的报告上指出,从运量上分析,兰渝铁路是沿线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中国铁路路网布局结构上是合理的,其沿线地质条件是可行的。

“从老红军的联名信到兰渝铁路的正式上马

1999年至2005年,是兰渝铁路能够正式纳入国家计划的关键7年,邓老向记者详述了这7年中的点点滴滴。

1999年,105位曾在甘川革命根据地、腊子口战役中流血流汗的老红军联名书写了《关于修建兰渝铁路致中央领导的一封信》,再次由邓成城转呈到了党中央。

1999年和2000年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率领考察团先后两次深入甘川渝三省(市)实地考察。在